

清人對滄浪詩學的反思

廖宏昌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清代詩學出現了極為明顯的折中趨尚，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有鑒於明代詩壇黨同伐異，各立門庭之弊病，於是清人反思明代詩壇流弊起始，上溯影響流弊之灶因，然後揚長去短，別開生面地建立其一家之言的詩學體系。而在反思明代詩壇流弊的過程中，滄浪詩學也成為清人借力使力的重要對象之一；清人為何擇取滄浪詩學以為討論的對象？滄浪詩學在清人批評理論系統中有何重要意義？即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關鍵詞：滄浪詩學、清代詩學、學問、性情、四唐、比興、妙悟

中國古代詩學發展到清代，出現了極其明顯的折中趨尚，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有鑒於明代詩壇之黨同伐異，各立門庭，其模式大皆不主一格，兼取眾長，其目的則在於成一家之言。正視清代詩論家成一家言之思維途徑，也就是從反思明代詩壇之流弊起始，進而上溯影響明代詩壇流弊之灶因，然後兼括眾長別開生面而成其體系，如此，方能透視清代詩學的特質。即如錢謙益（1582 - 1664）嘗云：「國初詩派，西江則劉泰和，閩中則張古田。泰和以雅正標宗，古田以雄麗樹幟。江西之派，中降而歸東里，步趨臺閣，其流也卑亢而不振；閩中之派，旁出而宗膳部，規摹唐音，其流也敷衍而無理。」¹指出明代江西末流詩歸楊士奇，卑亢不振之弊；閩中末流詩宗林鴻，膚弱無理之病，他並進而論及後七子、公安、竟陵「詩道三變」，及近代詩派之「詩病」²，然後歸結當代詩壇「學古而贗」及「師心而妄」兩大弊端³，其間論及《三百篇》、《文選》、《玉台新詠》，論及杜甫、溫、李，論及江西詩派，也論及《滄浪詩話》等等，其實，錢謙益並無意對前代詩作、詩人、詩派或詩論等優劣作全面性的評價，而重在討論其給明代詩學帶來多少正負面的影響，對前人的成就作出歷史的反思，建立一家之言的詩學體系。清代詩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大皆如此，而其中滄浪詩學即是清人反思的重要對象。清人為何擇取滄浪詩學作為反思的對象？滄浪詩學理論在清人批評系統中有何重要意義？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根柢原於學問

清代有鑒於明代清談之流禍，其學術取向是反思辨，重實學，而重實學的風氣也極深刻地影響清代詩學的風貌，大致而言，清代詩學非常側重創作主體的學問，無論任何流派，其詩論家都重學問，如黃宗羲（1610 - 1695）云：「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祇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耳。」⁴錢謙益云：「夫詩文之道，萌折於靈心，蟄起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⁵馮班云：「余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有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識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深，往往使才不盡。」⁶皆強調學問對詩歌創作之重要性，再如王士禛則云：

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85年2月），甲集〈劉司業崧〉。

² 參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稽勳宏道〉；及錢謙益：〈題懷麓堂詩鈔〉，《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卷83。

³ 錢謙益：〈王貽上詩序〉，《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卷17。

⁴ 黃宗羲：〈詩歷題辭·南雷詩歷〉，《南雷文定》（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2月）。

⁵ 錢謙益：〈題杜蒼略自評詩文〉，《牧齋有學集》，卷49。

⁶ 馮班：《鈍吟雜錄》（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9月），卷3。

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訴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於斯二者兼之，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⁷

「學問」與「性情」得兼之論，很明顯是針對明代詩學而發，謂前後七子重擬古而輕性情，公安、竟陵則重性情而流於空疏，王士禛之論必然有見於明代詩壇尖銳對立而欲加以折中，畢竟「性情」不是詩，「性情」只是創作動力的來源，唯有在適時的情況下被觸，鋪敘文字方能成詩⁸，因此，除了性情之外，尚須以學問作為創作的基礎，方能開拓眼界，掌握方法，呈現藝術之美。

然而，清代詩學又何以熱烈討論嚴滄浪？主要是因為滄浪之詩學為矯宋代江西末流餽釘古人、以學問為詩之傾向，力倡興趣妙悟，明代詩學竟將滄浪之論引向重情輕學之途徑，表現出空疏淺薄之一代詩風，清人為矯明代詩風，故重新檢視滄浪詩學，在性情與學問二者著力申論，滄浪也就成為清人重要的話題人物。前引王士禛之言，正可說明此一事實。且先就學問而言，嚴滄浪云：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⁹

王士禛「根柢」說，除了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外，又謂「為詩須博極羣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可不看。」¹⁰又曰「為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宜多親名師益友，以充其識見。」¹¹無論博極群書或氣、識之擴充，直與滄浪之說相契。而無論葉燮、汪琬、厲鶚、袁枚、翁方綱等，也都從不同側面肯定學殖根柢之重要，形成清代詩學普遍的思潮。

讀書重學在清代雖是普遍的思潮，但援引滄浪詩學以為討論對象，也有異於王士禛採正面服膺態度者，而持負面批評之角度以建立其個人理論體系的。周容（1619-1679）即云：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嚴滄浪之言，無不奉為心印。不知是言誤後人不淺，請看盛唐諸大家，有一字不本於學者否？有一語不深於理者否？嚴說流弊，遂至竟陵。¹²

⁷ 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11月），卷3。

⁸ 黃景進：《王漁洋詩論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6月，頁130~134）。

⁹ 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年，12月），〈詩辨〉。

¹⁰ 王士禛口授、何世璠述：《然鐙記聞》（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¹¹ 王士禛口授、何世璠述：《然鐙記聞》。

¹² 周容：《春酒堂詩話》（《清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

朱彝尊（1629 - 1709）亦持論如此，曰：

今之詩家，空疏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非關學」一語啟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¹³

又謂：

嚴儀卿論詩所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其言似是而非，不學牆面，焉能作詩？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爾，則少陵何苦讀書破萬卷？¹⁴

其論目的在矯空疏淺薄之詩風，乃針對公安、竟陵之弊病而發。至如汪師韓（生卒年不詳，雍正 11 年進士）再就另一角度詮釋曰：

三百篇、漢、魏之作，類多率爾造極。故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後人傳誦其語。然我生古人之後，古人則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學而能乎？依法則天機淺；憑臆則否臧凶，離之兩傷，此事固履之而後難也。且夫詩尚比興，必傍通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則不可一字無來歷矣。關關、呦呦之情狀；敦然、沃若之精神，夾漈特著論以明之，其要歸於讀書而已。傳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讀書且不可不博依也，而顧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為詩也哉？¹⁵

則從詩歌發展的法則及創作手法論述讀書重學，其引述滄浪之言，亦與周、朱氏同然，並非專論滄浪詩學。或許也固非專論滄浪，而有斷章取義、指責過當之嫌。沈德潛（1673 - 1769）即嘗針對此種現象論曰：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就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未為得也。¹⁶

又云：

作詩謂可廢學，持嚴儀卿詩有別才而誤用之者也，而反其說者，又謂詩之為道全在徵實，於是融洽貫串之弗講，而剿獵僻書，纂組繁縟，以夸奧博。¹⁷

又曰：

¹³ 朱彝尊：〈棟亭詩序〉，《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39。

¹⁴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月），〈徐火勃〉條。

¹⁵ 汪師韓：《詩學纂聞》（《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¹⁶ 沈德潛：《說詩碎語》（《清詩話》本），40則。

¹⁷ 沈德潛：〈汪茶圃詩序〉，《歸愚文鈔》（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東北大學藏書），卷12。

古人無不學之詩，李太白，曠世逸才也，而其始讀書匡山，至十有九年；杜少陵自言所得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知古人所以神明其業者，未有不從強學而得者也。自嚴滄浪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語，而誤用其說，遂以空疏鄙俗之辭，時形簡帙，而原來載籍者罕焉。其去詩道，日以遠矣。故詩雖超詣之難，而尤不根於學之足患。¹⁸

沈氏在清代被視為「格調說」的代表人物，而滄浪詩學實已開後代格調理論之先河¹⁹，雖沈氏並未明確標舉「格調」，然而其詩學則是有所折中而成其體系的，而明代詩學發展的歷史則是其主要折中的對象，沈德潛曾云：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而二百七十餘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別。嘗取有明一代詩論之：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然猶存元紀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永樂以還，體崇臺閣，駸駸不振。弘、正之間，獻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實、昌穀，左右驂靳，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采之雅正，高子業之冲淡，俱稱斐然。于鱗、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雖其間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咎其鮮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後，正聲漸遠，繁響競作，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比之自鄮無譏，蓋詩歌衰而國祚亦為之移矣。此升降之大略也。²⁰

其追求「雅音」、「雅正」之「大雅之章」，可見一斑，前、後七子在詩史上之地位，還是受沈氏肯定的，惜乎「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至於公安、竟陵受其批判，主要則在於背離「詩教」，背離詩教即是背離雅正，前述「空疏鄙俗」之譏，殆如是也，此亦沈氏辨明誤用滄浪詩學之旨意，而其一再申明為詩不可廢學亦可明矣。然而，作詩若專求學問，務在剿獵，則「厥弊維鈞」，過猶不及，故沈德潛嘗就詩歌藝術形象創造的審美特徵論曰：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博，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藉，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為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

¹⁸ 沈德潛：〈許雙渠挹山吟序〉，《歸愚文鈔》，卷13。

¹⁹ 參閱王鎮遠、鄔國平：《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頁447。

²⁰ 沈德潛：〈明詩別裁集序〉，《明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

已，雖多奚為？²¹

其把握詩歌創作「託物連類」、「借物引懷」的「比興」特點，認為表現宜蘊藉含蓄，不應質直敷陳，所謂「詞章記問之富」，即指以學問為詩，因此，發而為論，更在重學之外，側重「神明妙悟」，使其詩學體系在兼顧學問與比興之中，具備較強的說服力。同時，也廓清了前人對嚴滄浪詩學的誤解。

二、興會發於性情

再就性情而言，滄浪將「情性」之吟詠，提升至詩歌本質之高度，並在論述「情性」與「讀書」二者之基礎上，建構其著名的「興趣」說，這也是滄浪詩論的重心之一²²。王士禛面對滄浪詩學，則明確指出：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²³

又說：

嚴儀卿所謂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鹽味，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

皆以禪理喻詩。內典所云不即不離，不黏不脫；曹洞宗所云參活句是也。²⁴

「以禪喻詩」旨在藉禪理說明詩理，以作為認識詩歌本質之一途徑。諸多象喻看似深奧，其實也只是借用這些象喻說明詩歌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其構思既非正常思維，其詮釋自非一般言語所能表達，王士禛稱引「不即不離，不黏不脫」及「參話句」者，蓋詩歌有文字語言不傳之妙趣。滄浪有云：「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²⁵「妙悟」乃學詩之心領神會過程，依滄浪之見，則重在要求詩人汲取盛唐詩作之精髓及創作經驗。王氏是深契其說的，然而要臻及詩歌「神韻」的至高妙境，王氏更期待於「興會」。其實，「興會」與滄浪「妙悟」，皆標舉水月相色，空音鏡象的詩境，在創作的過程要求參前人之話句，在鑒賞的過程要求不泥於文字，把握「不即不離，不黏不脫」的原則。唯王士禛更強調主體「性情」的角色，如果挑剔王氏何以將滄浪之「妙悟」替換成「興會」，就在於「興會發於性情」。亦即謂其援「興會」而不用「妙悟」，與傳統詩論中「興」的基本意義有關，古來論「興」，大皆提及「性情」，劉勰即云：「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²⁶因此，「興會」者，指客體對詩人主體情感的直接引發觸動，王士

²¹ 沈德潛：《說詩碎語》，2則。

²² 黃景進：《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第三章〈嚴羽詩論的重心〉，頁61-126。

²³ 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3。

²⁴ 王士禛：《師友詩傳續錄》（《清詩話》本），第5則。

²⁵ 嚴羽傳、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辨〉。

²⁶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6年7月），卷8〈比興〉第36。

禎論〈王右丞詩〉曰：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²⁷

又曰：

香鑪峯在東林寺東南，下即白樂天草堂故址。峯不甚高，而江父通〈從冠軍建平王登香鑪峯〉詩云：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香鑪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贛石〉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祇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²⁸

諸此例證，皆足以說明其重在如何掌握詩歌的妙境以為創作之資，以臻及「神韻」之境，吳喬嘗許滄浪曰：

嚴滄浪謂詩貴妙悟，以言是也。然彼不知比興，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於唐人。²⁹依其見，則妙悟須與興比結合方能發揮其妙旨，王士禎以「興會」為登臨神韻之門徑，或與吳喬所見略同。

三、四唐之釐界

清人的折中趨尚實際上是表現為一種綜合的面貌，故在其創作之典範，並不單主一家或任一時代。雖然清代初期有較明顯的宗唐、宗宋傾向，但極明顯地已經遠邁明代非唐即宋之狹隘攻訐路線，而漸趨於創作規律之探尋和藝術美學的追求³⁰，因此，力主「詩必盛唐」的明前後七子受到清人的痛斥，也即時有所見，唯七子之復古理論以滄詩詩學為基礎，滄浪詩學一併也受到極熱切的批判，錢謙益即云：

江西宗派之說，嚴儀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為宗。信儀卿之有功於詩也。自儀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為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儀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偽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為易也。³¹

²⁷ 王士禎：《池北偶談》（《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卷18，〈談藝〉8。

²⁸ 王士禎：《漁洋詩話》（《清詩話》本），97則。

²⁹ 吳喬：《圍爐詩話》（《古今詩話續編》本，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9月），卷5。

³⁰ 參閱蔡鎮楚：《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長沙：岳麓出版社，1999年4月），頁421。

³¹ 錢謙益：〈徐元歎詩序〉，《牧齋初學集》，卷32。

著重批評其以盛唐為宗，影響此及，明代擬古之詩作，亦屬偽體，因此，錢氏更直指滄浪至高棣援四唐之說，以分析各時期之風貌，曰：

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今以初、唐、中、晚釐為界分，又從而判斷之曰：此為妙悟，彼為二乘；此為正宗，彼為羽翼。支離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冪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眼，沈錮于千載之下，甚矣詩道之窮也。³²

七子於四唐中擇盛唐而獨尊之，錢氏力斥之，並將七子之弊直溯滄浪，其於〈唐詩英華序〉辨之更明確，謂：

世人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棣。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鄙無識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³³

事實上，唐代詩歌史並不存在四唐，如果存在，應亦各自有其審美特徵，各有其價值存在³⁴，錢氏即以此論為基石，建立代有其詩的詩學觀。

錢氏之論，備具寬廣詩學的價值，在清初也得到不同的迴響，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朱彝尊云：

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棣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為四，以初、盛為正始、正音，目中、晚為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為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³⁵

即以心性面目嚴斥擬古之說，與錢乎遙相呼應。唯葉矯然（生卒不詳）則云：

³² 錢謙益：〈唐詩鼓吹序〉，《牧齋有學集》，卷 15。

³³ 錢謙益：〈唐詩英華序〉，《牧齋有學集》，卷 15。

³⁴ 參閱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132。

³⁵ 朱彝尊：〈王先生言遠詩序〉，《曝書亭集》，卷 38。

詩者謂初盛中晚之目，始於嚴滄浪而成於高廷禮，承譌踵謬，三百年茲，則大不然。夫初盛中晚之詩具在，格調聲響，千萬人亦見，胡可溷也？又謂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王維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如此論人論世，誰不知之？夫所謂初盛中晚者，亦不過謂其篇什格調中同者十八，不同者十二，大概言之而已，非真有鴻溝之畫，改元之號也。學者謂有初盛中晚之分，而過為低昂焉，不可也。如謂無低昂而併無初盛中晚之名焉，可乎哉？³⁶

葉氏以為四唐之時代特徵不可能不存在，可以嚴斥滄浪、七子之獨尊盛唐，但不宜抹滅四唐具有的時代性，蓋焦點有異，而側重之面不同耳。

四、比興妙悟之闡發

滄浪詩學的基本宗旨是尊唐而黜宋，尊唐的目的在於黜宋，也因此引發了後代的唐、宋詩之爭。滄浪前云「詩者，吟詠情性也」，吟詠情性，是滄浪詩學理論的基礎，滄浪甚至也將吟詠情性提昇至詩的本質地位，然而，唐、宋詩風貌之歧異，即在於情性之吟詠。宋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³⁷，言理罕言情，站在唐詩派者而言，其不問興致，自有違詩歌之審美規律；盛唐詩吟詠情性，表現為「興趣」、「興致」、「意興」之妙，故展現出極高的審美藝術成就。因此，嚴滄浪所謂之「以禪喻詩」、「妙悟」及「興趣」諸說，因唐、宋詩之爭，又成為清人討論的熱門話題。「以禪悟詩」旨在借禪理說明詩理，以作為認識詩歌本質之一途徑；雖此途徑非滄浪首創³⁸，但將以禪喻詩的方法加以歸納，使之更具理論系統，仍不失其獨到見地。「妙悟」則是學詩之心領神會過程，而將詩歌創作的形象思維特點提升至理論的層次，是其重要意義，如依滄浪之見，則重在要求詩人汲取盛唐詩作之精髓及創作經驗。「興趣」指詩作中情景交融，毫無斧鑿痕跡的佳妙情趣，在滄浪詩學中，意在提倡以盛唐詩歌為法式，反對以理入詩，以文入詩，逞學弄才之創造藝術。此外，與此三者相關之「比興」，也成為清人討論的焦點，「比興」是詩歌創作的表現手法，重在運用委婉的比喻象徵，如就唐、宋詩作為對照，則唐詩重在比興，宋詩多用賦體；或曰比興是落實妙悟境界及創作富含興趣的具體表現方式。

³⁶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清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初集。

³⁷ 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辨〉。

³⁸ 參閱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頁15-23。黃景進：《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第四章，頁127-210。

錢謙益即批評滄浪之「妙悟說」云：

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其似是而非，誤人箴芒者，莫甚于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³⁹

即立足於此，錢氏援引《詩經》之發露指陳、理道議論的傳統，認為「作為歌詩，往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⁴⁰，一方面對滄浪唯在妙悟之言作了折中，直指詩歌除了抒情之外，尚可敘述議論、道理鋪陳；一方面也因援引《詩經》作為終極典範，而讓其論調更具說服力，從而奠定其兼括唐、宋的清代詩學風貌。

明代詩學主流基本上是服膺盛唐抒情傳統的，因此極排斥宋詩的鋪陳理道，言理主理故乏比興，清人折中明代詩學，兼括唐、宋，既重情主理，也重比興。馮班（1614 - 1681）立論即以此為基。馮班與錢謙益主張稍異，但與錢氏也同時批評滄浪，其批評滄浪在於「不落言筌，不涉理路」，其與錢氏有異，則在於錢重賦而馮重比興，馮班云：

按此二言，似是而非，惑人為最。……至於詩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詩者，諷刺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誹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思無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⁴¹

馮班肯定詩歌之理，但強調的是理在文外，不與一般文章言理相同，非如滄浪所謂之「不落言筌，不涉理路」。其時賀裳（生卒不詳），也曾云：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必理與辭相輔而行，乃為善耳，非理可盡廢也。詩又有以無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語。至如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則又無理之理，更進一層。總之，詩不可執一而論。⁴²

將詩之理分析的更加透徹，所謂「理不礙詩」，所謂「無理而妙」，所謂「無理之理」，

³⁹ 錢謙益：〈唐詩英華序〉，《牧齋有學集》，卷15。

⁴⁰ 錢謙益：〈嚴印持廢翁詩稿序〉，《牧齋初學集》，卷33。

⁴¹ 馮班：《鈍吟雜錄》，卷5。

⁴² 賀裳：《載酒園詩話》（《清詩話續編》本），卷1。

皆較馮班之論更加圓融。至如葉燮（1627 - 1703）「名言所絕之理」⁴³的分析，最是精闢，也顯見清人對詩歌獨特藝術規律的探討，已有更貼近本質性的認識。

馮班認為詩歌之「理玄，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因之，其詩論重在「比興」，其兄馮舒（1593 - 1649）即云：

大抵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心有所在，未可直陳，則托為虛無恟恍之詞，以寄幽憂騷屑之意。昔人立意比興，其凡若此。自古及今，未之或改。故詩無比興，非詩也。⁴⁴

錢謙益強調鋪陳理道，重在「賦」，馮氏雖亦肯定詩歌之理，但主理在文外，故心之所之，發言為詩，不可直陳如文，而務在以比興之方式，「托為虛無恟恍之詞，以寄幽憂騷屑之意」，詩、文之別，即在乎比興之有無。唯其所言之比興與明人不同，明人之比興純就藝術上之手法言之，即如許學夷云：「詩有景象，即風人之興比也。唐人意在景象之中，故景象可合不可離也。」⁴⁵馮氏重在諷刺，故前云「詩者，諷刺之言也」；又云：「詩以諷刺為本，尋常嘲風弄月，雖美而不關教化，只是下品」⁴⁶，易言之，其比興是要符合儒家溫柔敦厚之諷刺教化，堪足比附漢代將比興看作政教風化之形象。

吳喬（1611 - ？）之主比興，認為：

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比興，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於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⁴⁷

援妙悟以建立其比興說，甚至認為唐、宋、明詩間之優劣，即在乎比興，以為：

宋人不知比興，小則為害唐體，大則為害于《三百》。⁴⁸

又云：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⁴⁹

有謂：

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⁵⁰

其以比興說詩，然後以比興論唐、宋、明詩之優劣，以建其詩學體系。

⁴³ 葉燮：《原詩》（《清詩話》本），卷2內篇下。

⁴⁴ 馮舒：〈家弟定遠遠游仙詩序〉，《默庵遺稿》（《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87），卷9。

⁴⁵ 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月），卷17。

⁴⁶ 韋穀集：《才調集》（《二馮先生評閱》本，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0年2月），卷1白居易〈翫半開花贈皇甫郎中〉。

⁴⁷ 吳喬：《圍爐詩話》（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9月），卷5。

⁴⁸ 吳喬：《圍爐詩話》，卷1。

⁴⁹ 吳喬：《圍爐詩話》，卷5。

⁵⁰ 吳喬：《圍爐詩話》，卷5。

清人建立其詩學體系的模式，大較是不拘一格，兼取眾長，其批評前人或論著，無論從正面或反面，其目的都在尋找立論之根據。滄浪詩學無論在讀書學古、以禪喻詩或比興妙悟，都提供了許多可以再闡述發揮之空間，本文的探討，對於分析清人詩學體系之建立模式，必有所助益焉。

五、結語

清人擇取滄浪詩學作為反思的對象，雖則有諸多不同的主題側面，然而就共時的角度視之，無非是在尋求成其代之詩的理論根據。因為清代詩學作為中國古典詩學發展最後的總結階段，在反思傳統，尤其面對前一個時期明代詩學的表現下，該如何自處及期許，本即是清人必須勇於面對的重大問題，清初尤侗（1618 - 1704）即嘗自覺地表述：

詩無古今，惟其真爾。有真性情，然後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後有真風調；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自成其本朝之詩而已；勿問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⁵¹

其謂「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自成其本朝之詩而已；勿問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即可看出清人在總結前人詩歌成就與經驗時的無奈，也適時道出清人該面對、能面對的詩學發展途徑。尤侗認為：在學習的態度方面，必欲無分古今，方能成其時代之詩；在創作的表現方面，必欲情尚其真，而後能成其自家風格。清人終亦能如尤侗所言，以「自成其本朝之詩」、「自成其本人之詩」自勉，在傳統詩學諸多理論中尋求借鏡，在諸多不同的主題側面中探索理論的深度。

清人建立其詩學體系之模式，大較是兼取眾長，不拘一格，因此，無論從正面或負面探討滄浪詩學，自亦不在滄浪詩學理論之發微，而是借力使力，從中尋求自我詩學體系完成之根據。而在上述析論中，諸多側面的探索，其實都圍繞在「性情」、「學問」二者。強調「性情」，其論點重在個性；強調「學問」，其論點重在讀書。即此，清人滄浪詩學的反思，一者是針對明代偏勝對立詩壇之弊病而發，一者則破而有立，將偏盛折中，揚長去短，以建立其一代之詩、一己之詩的期許。

⁵¹ 尤侗：〈吳虞生詩序〉，《西堂雜俎》（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12月），卷上。

主要參考書目

- 《才調集》，韋穀集，《二馮先生評閱》本，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0年2月
- 《文心雕龍註》，劉勰著、范文瀾註，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6年7月
- 《池北偶談》，王士禛，《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 《西堂雜俎》，尤侗，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12月
- 《列朝詩集小傳》，錢謙益，台北：世界書局，1985年2月
- 《明詩別裁集》，沈德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
- 《牧齋有學集》，錢謙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
- 《牧齋初學集》，錢謙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
- 《春酒堂詩話》，周容，《清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
- 《南雷文定》，黃宗羲，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2月
- 《帶經堂詩話》，王士禛，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11月
- 《圍爐詩話》，吳喬，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9月
- 《然鐙記聞》，王士禛口授、何世璠述，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 《鈍吟雜錄》，馮班，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9月
- 《滄浪詩話校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年，12月
- 《詩源辯體》，許學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月
- 《詩學纂聞》，汪師韓，《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北京：人民人學出版社，1998年2月
- 《龍性堂詩話》，葉矯然，《清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
- 《默庵遺稿》，馮舒，《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87
- 《曝書亭集》，朱彝尊，《四部叢刊》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歸愚文鈔》，沈德潛，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東北大學藏書
-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蔡鎮楚，長沙：岳麓出版社，1999年4月
- 《王漁洋詩論之研究》，黃景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6月
- 《清代文學批評史》，王鎮遠、鄔國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
- 《清代詩學研究》，張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

Ch'ing Scholars' reconsideration of Yen Yu Poetics

Hung-Chang Lia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was an obvious compromising trend on Ch'ing poetics because of the partisan rival on Ming poetics. Therefore Ch'ing scholars traced back to the cause of this rival, corrected it and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poetic system. In this process, the case of Yen Yu became a focus of discussion. Why Yen was chosen as the object of discussion? Why his poetics was significant in Ch'ing scholarship?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this paper tries to resolve.

Keywords: Ch'ang-lang Poetics, Ch'ing poetics, learning, personality, four T'angs, allegory, enlightenment